

农村边缘贫困群体致贫风险检视及抗逆力提升研究 ——以川甘涉藏地区为例

唐雅霜, 张华泉, 贺一然, 朱利
(四川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 四川 成都 611300)

摘要: 基于川、甘涉藏地区实地抽样调查的 437 份农牧民家庭问卷数据, 首先运用 VEP 方法测度样本家庭的贫困脆弱性, 接着从实证的角度探究影响贫困脆弱性的因素并进一步通过夏普利值分解法明晰影响因素的贡献度。研究发现: 第一, 至少有 10% 的样本户面临较高的致贫风险; 第二, 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村集体经济发展、生计多样性、村干部身份、自我发展意愿能够有效降低贫困脆弱性, 而健康冲击、家庭抚养比增加、自然灾害冲击则显著增加了贫困脆弱性。其中, 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村集体经济发展、生计多样性对贫困脆弱性变化的贡献度最大。

关键词: 涉藏地区; 致贫风险; 贫困脆弱性; 抗逆力

中图分类号: F320.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98(2022)03-0030-08

一、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明确指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 要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意味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成为当前推动乡村振兴的基础。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完成的基础任务则落脚于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为此,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的指导意见》, 指出“目前还有一些脱贫户的发展基础比较脆弱, 一些边缘户还面临致贫风险, …… 脱贫地区特别是原深度贫困县摘帽时间较晚, 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薄弱, 容易发生返贫致贫现象”。因此, 防止返贫与新增贫困, 成为 2020 年后巩固脱贫成果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多措并举巩固成果……及时将返贫和致贫人口纳入帮扶”。2020 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带来了挑战。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 疫情不仅直接制约了农户的收入, 更产生了间接影响, 影响农户后续的持续增收。新冠疫情给边缘贫困群体带来的致贫风险表现在宏、中、微观三个层面。宏观层面上, 疫情带来的通货膨胀风险直接影响了边缘贫困群体的正常生产生活, 引起的失业风险更是直接减少其收入; 中观层面上, 疫情对区域产业发展的影响, 尤其以旅游业为代表, 直接影响到农户增收; 微观层面上, 边缘贫困群体在自身健康水平、经济能力、社会地位等方面处于劣势, 自身对于疫情冲击的抵御能力较差, 且相较于建档立卡户, 缺乏各项福利政策的保障, 容易产生心理失衡现象。

提高边缘贫困群体在疫情冲击下的抗逆力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方式之一。基于上述背景与问题导向, 关注如何防止新增贫困这一问题, 落脚于面临致贫风险的边缘户, 考虑到作为“三州三区”之一涉藏地

收稿日期: 2021-09-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四省藏区临界贫困群体‘悬崖效应’缓释及精准扶贫政策调适研究”(19CSH029); 四川省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疫情冲击下边缘贫困户致贫风险检视及抗逆力提升研究——以四川藏区为例”(202010626078)

作者简介: 唐雅霜(1998—), 女, 四川仁寿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发展; 张华泉(通信作者)。

区的特殊性,对边缘贫困群体面临的致贫风险进行系统性检视,研究边缘贫困群体抗逆力提升的路径。一方面,本文研究内容对有效缓释疫情冲击下边缘户面临的致贫风险、防止边缘户成为新增贫困群体具有重要价值,可为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提供思路,推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另一方面,本文选择的研究地区属于民族地区,加强对该群体的关注有助于增加其获得感,不仅可以改善边缘贫困群体因未能享受到政策福利产生的心理失衡,提高该特殊群体的经济水平,缩小个体间贫富差距,而且对民族团结和地区稳定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 边缘贫困群体的相对贫困处境

近年来由于边缘贫困群体容易成为未来新增贫困群体的特殊性,研究相对贫困问题的学者们也逐渐把视野转向了边缘贫困群体。管睿等(2020)把边缘贫困群体定义为家庭人均纯收入略高于贫困线标准、未被认定为贫困户、在生产或生活中仍存在较多困难的一类群体^[1]。左停等(2020)通过归纳边缘贫困群体的特征,认为农村边缘贫困群体往往面临收入低下、人力资本低下、权益争取能力低下等现实困境^[2]。张琦等(2020)调研发现,非建档立卡“五类户”^①是典型的游离于贫困边缘的一类群体,其收入略高于贫困线,但自身发展能力有限,一旦遭受自然灾害、疾病、家庭事故等冲击,无法通过自身来化解,又缺乏完善的政策保障,极易陷入贫困^[3]。高鉴国和范丛(2020)通过青岛市的调查样本发现,低保家庭具有老年人比例高、医疗负担重、家庭收支缺口大、自我改变能力差、生活悲观等特征,这一群体的边缘贫困产生机制来源于外在的风险冲击与内在的脆弱性^[4]。

在边缘户和建档立卡户之间存在扶贫政策的悬崖效应不容忽视。一方面,扶贫政策的悬崖效应使得边缘贫困群体由于缺乏相应保障与较弱的增收能力而比建档立卡户更易陷入贫困。潘文轩(2020)通过对2020年以前贫困地区的贫困增量进行估算并对其成因的结构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边缘贫困群体在主要致贫原因疾病的冲击下,由于健康扶贫政策的悬崖效应,相较于建档立卡脱贫户,更易陷入贫困^[5]。另一方面,扶贫政策的悬崖效应易使边缘贫困群体产生负面与消极情绪,不利于精神富裕。朱冬亮(2019)研究发现在扶贫政策的悬崖效应下,边缘户遭受政策排斥,极易引致他们的心理不平衡感和相对剥夺感^[6]。Flores et al.(2008)、Ekpa et al.(2017)发现健康支出、农业生产投入品成本波动导致的风险冲击也加剧了边缘贫困群体的“不公平感”^[7-8]。

(二) 致贫风险与贫困脆弱性

从大多数学者的观点看,边缘贫困群体易致贫是因为农户贫困脆弱性较强,而贫困脆弱性则与风险紧密相关。世界银行在2000年提出了贫困脆弱性这一概念,后被多数学者用于动态贫困领域的研究,多用于预测家庭面对未来各种不确定性时陷入贫困的概率。

当前边缘贫困群体面临的致贫风险是复杂的、多元的、变化的。左停等(2020)通过分析农村居民收入与支出的变化,发现收入增幅小于消费支出的增幅,由于缺乏多重保障政策兜底,边缘贫困户在医疗、教育等方面支出的压力可能会增加,存在支出性贫困的隐患^[2]。左停和赵梦媛(2021)认为当前农村居民面临的致贫风险由传统向传统与非传统并存演变,传统风险包含自然灾害、市场价格波动、健康风险、老年风险以及失业风险等,社会转型过程中衍生的非传统风险包含环境污染、工作伤害、大病慢病、精神空虚以及家庭支出刚性造成的不可逆性非农就业风险等^[9]。涉藏地区作为脱贫攻坚前14个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较为薄弱,发展环境处于劣势,边缘贫困群体占比较高、发展能力较弱,且受到藏传佛教教义影响,有一定的特殊性。李俊杰和宋来胜(2020)指出教育助推“三区三州”跨越贫困陷阱时,在宗教信仰、农户自身素质、教育扶贫政策单一的多重影响下,教育扶贫效果不明显^[10]。

边缘贫困群体由于自身条件与外部政策保护的相对劣势,在面临各种风险冲击时抵御能力弱,表现出较高的贫困脆弱性。黄潇(2018)运用CLDS数据测度了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并考察了教育、健康、外出务

① 非建档立卡“五类户”包含独居老人、低保户、五保户、大病慢性病人危房户和无劳动能力户。

工、社会交往、资产水平、家庭背景、经济增长等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和贡献度,发现教育水平提升、社会资本、非农就业、迁移、生产性融资都有助于降低贫困脆弱性,但父辈劣势的代际传递会提升贫困脆弱性,需要系统的扶贫政策进行干预^[11]。蒋应刚等(2020)对西藏贫困多维性和脆弱性进行定量测度和评价,发现其贫困类型可以划分为人力资本缺乏型、基础设施缺乏型、金融资本缺乏型、生计途径缺乏型,且存在各种类型叠加的状况^[12]。就边缘贫困群体的脆弱性研究来看,郭立平(2018)在研究精准扶贫的内生矛盾时,指出贫困线附近人口的可持续能力非常脆弱,“反噬”时有发生,特别是在自然灾害、疾病等变故面前,陷入贫困陷阱的“弹性门槛”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13]。国外相关研究也印证了这一规律。比如,Zacharias(2017)的研究表明时间赤字的存在,导致边缘贫困家庭必须从市场中购买家庭服务的替代品,从而导致同等收入家庭面临差异的生活质量^[14]。

(三) 抗逆力提升研究

抗逆力与贫困脆弱性是共生共存的。抗逆力源于机械力学与工程学,后被衍生至心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应用。在贫困研究领域,抗逆力可表现为对于意外冲击的内在抵御能力和外在保护力。朱华桂(2012)总结学者们对抗逆力内涵的认知,表示其核心是“遭遇风险、用于抵抗风险的能力与资源、脱离风险的过程及其积极的应对结果”^[15]。陈艾和李雪萍(2015)拓展整合了脆弱性分析框架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引入抗逆力,构建了“脆弱性—抗逆力”分析框架,研究了连片特困地区农牧民生计问题,认为贫困治理需要增强抗逆力,消减脆弱性^[16]。韩斌和孔继君(2018)以云南省为例,从脆弱性—抗逆力角度研究西部地区的扶贫策略优化路径,提出要提升个体、社区和政府各层面的抗逆能力,降低陷入贫困的风险^[17]。孟越和陈文宽(2019)从抗逆力理论出发,研究四川藏区生态脆弱区农牧民生计发展路径,认为应该从包含政府抗逆力、社区抗逆力、家庭抗逆力、个人抗逆力的多元主体抗逆维度出发,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增强农户抗逆力^[18]。左停等(2020)通过构建“风险—脆弱性”整合性分析框架,从建立风险意识、加强预警预报、提高抗逆保护、提升农户生计能力和开展救助保障等方面提出立体式、全过程农民生计抗逆力提升的应对措施和对策建议^[19]。

就文献梳理来看,当前学术界对于边缘贫困群体及其抗逆力提升已经有所关注。但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还缺乏对疫情冲击下边缘贫困群体如何提升其抗逆力方面的深度研究。进一步地,在共同富裕的视阈下,精神富裕与物质富裕并重,鲜有文献考虑到边缘贫困群体的自我发展意愿对于其抗逆力提升的影响。而这些正是本研究有望作出边际贡献的地方。笔者将基于预期的贫困脆弱性测度方法,研究宏、中、微观三个层面影响涉藏地区农牧民贫困脆弱性的主要因素,并进一步基于夏普利值分解方法提出提升涉藏地区边缘贫困群体抗逆力的现实路径。

三、研究设计

(一) 理论模型

梳理国内外文献发现,学者将风险纳入贫困脆弱性分析框架,考察在风险冲击下研究对象对变化的响应以及适应能力。进一步通过夏普利值分解,可以找出致贫的主要因素,能够有针对性地探求干预策略,提升研究对象的抗逆能力。

目前学界量化贫困脆弱性的模型主要有三种:期望效用的脆弱性(VEU)、风险暴露的脆弱性(VER)、期望贫困的脆弱性(VEP)。

其中,前两种方法对所需数据的要求较为严格,相关的实地调研数据较难获得,而第三种方法VEP对数据的要求较为宽松,仅要求截面数据。因此,选取第三种方法VEP来量化贫困脆弱性,VEP法的基本逻辑是,用可观测到的变量以及冲击因素对收入进行回归以得到未来收入的表达式,进而假设收入的对数服从正态分布,由此得到未来收入低于贫困线的概率,这个概率就被称为贫困脆弱性。

参考前人研究,贫困脆弱性(VEP)定义式如下:

$$V_{h,t} = \text{Pr ob}(\ln C_{h,t+1} < \ln Z/X_h)$$

其中, $V_{h,t}$ 代表家庭h在t时期的贫困脆弱性, $C_{h,t+1}$ 代表家庭h在t+1期的收入,Z代表判别贫困的标准,即贫困线。 X_h 为影响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系列变量。为估计 $V_{h,t}$,需要预测未来收入 $C_{h,t+1}$ 并明确

其收入分布。

首先,估计收入方程,将回归后得到的残差平方取对数后作为收入波动进行 OLS 估计,估计方程如下:

$$\begin{aligned}\ln C_h &= X_h\beta + e_h \\ \ln e_h &= X_h\rho + \varepsilon_h\end{aligned}$$

其中,根据样本特征分析,选取户主性别、教育、政治面貌、自评健康水平、职业类别、社会资本、劳动力占比作为衡量影响未来收入的变量。同时,为消除个体差异的影响,在回归中引入纯牧区、半农半牧区、纯农区的虚拟变量。

用第一步得到的拟合值构建权重进行 FGLS 估计,得到对数收入的期望值和收入波动,如下:

$$\begin{aligned}E(\ln C_h | X_h) &= X_h\beta_{FGLS} \\ E(\ln C_h | X_h) &= \sigma_{e_h}^2 = X_h\rho_{FGLS}\end{aligned}$$

然后,选择贫困线,计算家庭 h 的贫困脆弱性 Vul_h 。鉴于我国已处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阶段,采用世界银行规定的贫困标准,即人均可支配收入 4500 元左右作为识别标准。

$$Vul_h = \Pr ob(\ln C_h < \ln Z | X_h) = \varphi\left(\frac{\ln Z - X_h\beta_{FGLS}}{\sqrt{X_h\rho_{FGLS}}}\right)$$

最后,根据贫困脆弱性的大小与分布来划线,参考大多数学者的做法^[20],将脆弱性线定为 0.5,大于 0.5 即认为该家庭面对的致贫风险较大,在未来会大概率陷入贫困。

进一步地,将贫困脆弱性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方程,进行夏普利值分解,考察主要变量对贫困脆弱性的贡献程度。回归方程如下:

$$Vul_h = \alpha + \sum_{i=1}^9 \beta_i X_i + \varepsilon_h$$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 2020 年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X_i 表示影响贫困脆弱性的重要变量。解释变量为宏观层面的自然灾害冲击、疫情冲击,自然灾害冲击和疫情冲击,直接通过影响农户的生产生活减少其家庭收入,预计其会增加贫困脆弱性^[21];中观层面的村集体经济,其中,顾宁和刘洋(2021)研究发现,产业扶贫可以显著降低贫困脆弱性,发展村集体经济是当地产业扶贫的重要举措,预期其会降低贫困脆弱性^[22];微观层面的户主受教育水平、家庭抚养比、生计多样性、健康冲击、村干部身份以及家庭自我发展意愿。

教育和健康是基本的人力资本,预计教育、健康水平的提高会降低贫困脆弱性。蒋应刚等(2020)通过研究西藏自治区贫困的脆弱性发现,影响贫困脆弱性的显著因素包含生计多样性、抚养比,预计生计多样性会降低贫困脆弱性,而抚养比会增加贫困脆弱性^[12]。家庭自我发展意愿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群体的内生发展动力,耿新(2020)研究返贫风险时发现,农户自身发展动力不足是一重要因素^[23],因此预计自我发展意愿的增加会降低贫困脆弱性。家庭成员担任村干部实则代表家庭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本,预计其会降低贫困脆弱性^[24]。

(二) 数据来源

笔者所在团队分别于 2021 年的 1 月、3 月、7 月前往四川省和甘肃省的涉藏地区开展实地调研,调研地区涵盖 13 个县域,包括四川省的马尔康市、若尔盖县、红原县、黑水县、理县、汶川县以及甘肃省的合作市、临潭县、夏河县、卓尼县、玛曲县、碌曲县、迭部县。

调研团队通过入户访谈、在村委的集中组织下填写问卷、委托当地基层干部协助填写问卷并寄回等方式收集到了关于当地农村家庭基本特征的一手数据。

截至 2021 年 8 月,调研团队共收集到关于非建档立卡户的问卷数据 534 份,其中,四川地区收集问卷共 375 份,甘肃地区收集问卷 159 份。基于本文研究所需数据,删除异常值、离群值及缺失值后得到有效样本 437 个。

(三)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1. 主要变量说明。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标签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Income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2020 年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Education	户主受教育程度	没有上过学 = 1; 小学 = 2; 初中 = 3; 高中 = 4; 高中以上 = 5	
	Support	抚养比例	(60 岁以上 + 16 岁以下) 的人数 / 16 岁至 60 岁的人数	
	微观	Job	生计多样性	家庭工作种类数赋值, 取值为 1~4
		Medical	健康冲击	过去一年家里是否有人住院 = 1, 否 = 0
		Cadre	村干部身份	有家庭成员为村干部 = 1, 否 = 0
	中观	Develop	家庭自我发展意愿	未来有经营发展计划 = 1, 否 = 0
		Collective	集体经济	参与了集体经济 = 1, 否 = 0
	宏观	Corona	疫情冲击	因疫情减少收入 = 1, 否 = 0
Disaster		自然灾害	过去一年遭受了自然灾害赋值 = 1, 否 = 0	

2.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变量数据特征统计见表 2, 由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均值虽然超过了 10000 元, 但是最小值 4166 元和最大值 50000 元之间相差过大, 25% 分位数仅为 5714.29 元, 说明有 25% 的样本仍游离于贫困线, 面临的致贫风险较高; 涉藏地区户主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 多为小学学历; 涉藏地区的家庭抚养比差距较为明显; 涉藏地区多数农牧民的生计种类较为单一, 有两种及以上生计途径的家庭仅占 25%; 样本户自我发展意愿不强, 仅有 25% 的家庭对未来有经营发展计划; 地方集体经济发展覆盖面较广, 75% 的样本户所在地村集体经济有所发展并分红; 疫情冲击的影响面也较广, 达 75%; 有 25% 的样本户在过去一年遭受了自然灾害, 对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造成了影响。

表 2 变量基本统计特征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25 分位数	50 分位数	75 分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Income	12743.12	14563.84	5714.29	8750	15000	4166.67	50000
Education	1.55	0.88	1	1	2	1	4
Support	0.33	0.23	0.2	0.3	0.5	0	1
Job	1.56	0.71	1	1	2	1	4
Medical	0.41	0.49	0	0	1	0	1
Cadre	0.2	0.4	0	0	0	0	1
Develop	0.39	0.49	0	0	1	0	1
Collective	0.72	0.45	0	1	1	0	1
Corona	0.68	0.47	0	1	1	0	1
Disaster	0.29	0.466	0	0	1	0	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贫困脆弱性的测算

根据前文贫困脆弱性测度的方法, 计算出的贫困脆弱性相关结果如表 3 所示。贫困脆弱性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 0.4869 和 0.4851。表明大多数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较低, 其应对风险的能力较强。但在 90 分位数上, 贫困脆弱性已经超过 0.5, 表明至少有 10% 的群体可能面临较高的致贫风险或是自身的风险抵御能力较低。可以进一步地通过夏普利值分解法来分析贫困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素, 进而探索面临较高致贫风险的边缘易致贫群体提升抗逆力的可行路径。

表 3 贫困脆弱性的分布表

Vul	均值	标准差	10 分位数	25 分位数	中位数	75 分位数	90 分位数
	0.4869	0.0188	0.4648	0.4747	0.4851	0.4977	0.5110

(二) 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及其分解

根据上文计算出来的贫困脆弱性, 将贫困脆弱性作为被解释变量对上述各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得到结果如表 4 所示。

在微观层面, 户主受教育水平、生计多样性、家庭中有村干部、有自我发展意愿对贫困脆弱性有着显著的

负向影响,意味着它们能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缓解陷入贫困的风险,这与现实是相符的。户主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家庭的认知能力会更强,更容易倾向于外出打工或依靠当地旅游业发展特色产业;家庭的生计种类越多,家庭收入稳定性更好,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外出务工家庭的收入波动明显大于外出务工和发展特色农牧业兼具的家庭;家中有村干部意味着家庭拥有良好的社会资本,因为村干部大多是村民选举出来的带领大家致富的“被信任者”;有自我发展意愿家庭往往内生动力较强,更愿意积极寻找增加家庭收入的途径,因而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家庭抚养比和健康冲击却是贫困脆弱性的显著正向影响因素,意味着涉藏地区的养老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值得关注。

在中观层面,地方的村集体经济发展能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村集体经济对农户的带动作用体现在通过分红直接增收,通过促进就业和带动地方特色产业发展间接增收。

在宏观层面,自然灾害冲击增加了涉藏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而疫情冲击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暂不显著。涉藏地区尤其是高海拔地区多属于生态脆弱区,自然灾害较为频繁,对农户的生产生活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涉藏地区较为偏远,疫情虽然给农牧民的收入带来了一定冲击,但鉴于当地政府良好的管理和防控措施,当地有序恢复其生产生活较快,且当地外出务工的家庭多在本县或邻县务工、依赖旅游业的家庭投入成本可控且也有其他的生计途径,因而未对贫困脆弱性造成显著影响。

表4 贫困脆弱性方程回归结果

vul	Coef.
Education	-0.019(0.002)***
Support	0.03(0.006)***
Job	-0.013(0.002)***
Medical	0.006(0.003)*
Cadre	-0.007(0.004)*
develop	-0.007(0.003)**
Collective	-0.039(0.004)***
Corona	0.002(0.003)
Disaster	-0.001(0.003)*
Constant	0.697(0.006)***
Adj R-squared	0.539
F-test	37.901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

在以上回归的基础上,采用 Huettner & Sunder(2012)提出的基于 R^2 的夏普利值分解法,计算各解释变量对贫困脆弱性的贡献程度,得到的结果如表 5 所示。可以看出,在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因素中,受教育水平的贡献率最大,达到了 37.74%;其次是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再者是生计多样性;最后分别是村干部身份、自我发展意愿。在贫困脆弱性的正向影响因素中,家庭抚养比和自然灾害较为突出。该结果表明,要巩固当前涉藏地区的脱贫攻坚成果,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教育发展、地方产业可持续振兴以及职业技能培训的加强,当然,也要注重其他因素的影响。

表5 贫困脆弱性的夏普利值分解

变量名	夏普利值	百分比(%)
Education	0.195	37.74
Support	0.036	6.98
Job	0.068	13.22
Medical	0.003	0.63
Develop	0.008	1.6
Cadre	0.043	8.27
Collective	0.156	30.27
Corona	0.001	0.11
Disaster	0.006	1.17
Total	0.516	100.00

五、结论及建议

通过检视川、甘涉藏地区样本农户面临的致贫风险,测度其贫困脆弱性,发现:(1)至少有10%的农户面临着较高的致贫风险;(2)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村集体经济发展、生计多样性、村干部身份、自我发展意愿能够有效降低贫困脆弱性,而健康冲击、家庭抚养比增加、自然灾害冲击则显著增加了贫困脆弱性。本文关注的疫情冲击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尚不显著,疫情虽然冲击了涉藏地区农牧民的家庭收入,但得益于政府的有效管控措施与该群体的生计特征,未显著加剧其致贫风险。

后扶贫时代,应当加强对涉藏地区边缘易致贫群体的关注与扶持,在政府保障、社会带动、个体提升的三重保障下,提升其面对致贫风险的抗逆力。在政府保障方面,围绕大病、教育、自然灾害等主要致贫原因对边缘户实施针对性措施,如资助购买大病补充保险、积极开展大病临时救助、加大助学奖学力度等,对于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冲击要保障边缘贫困户的正常生产生活;在社会带动方面,可以积极培育涉藏地区农村新型经营主体,支持边缘户以草地、林地、耕地、农机具、技能等生产资料参与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建立稳定的“现代农业+小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持续稳定增收;在个体提升方面,应该重视教育引导作用。一方面,在青少年中要抓好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在青壮年中要推行职业技能培训,培植贫困户数字普惠金融意识^[25],发展新型职业农牧民;另一方面,要“扶贫扶志”相结合,激发农牧民的发展积极性。

参考文献:

- [1]管睿,刘旋,余劲.精准扶贫政策与边缘贫困群体政治信任——基于断点回归的证据[J].农业技术经济,2020(3):97-109.
- [2]左停,赵梦媛,苏青松.聚焦贫困预防:基于贫困边缘人群和新生贫困人群的对策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20(9):147-154.
- [3]张琦,杨铭宇,孔梅.2020后相对贫困群体发生机制的探索与思考[J].新视野,2020(2):26-32+73.
- [4]高鉴国,范丛.低保边缘家庭的贫困表征、致贫原因与政策建议[J].东岳论丛,2020(10):133-141+192.
- [5]潘文轩.贫困地区返贫与新增贫困的现状、成因及对策——基于扶贫对象动态管理数据的统计分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72-81.
- [6]朱冬亮.贫困“边缘户”的相对贫困处境与施治[J].人民论坛,2019(7):58-60.
- [7]Flores G., Krishnakumar J., Doorslaer E. V. Coping with Health - Care Costs: Implications for the Measurement of Catastrophic Expenditures and Poverty[J]. Health Economics, 2008(12):1393-1412.
- [8]Ekpa D., Oyekale O. I., Akinyemi M. Poverty Status of Climate Smart Agricultural Farmers in North West Nigeria - Application of Foster Greer and Thorbecke Model[J]. American Journal of Rural Development, 2017(5):138-143.
- [9]左停,赵梦媛.农村致贫风险生成机制与防止返贫管理路径探析——以安徽Y县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7):32-41.
- [10]李俊杰,宋来胜.教育助推“三区三州”跨越贫困陷阱的对策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20(1):30-36.
- [11]黄潇.什么引致了农村居民贫困风险——来自贫困脆弱性测度和分解的证据[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8(1):91-102.
- [12]蒋应刚,朱昌丽,张继飞.西藏贫困的脆弱性和多维性——以昌都、日喀则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0(12):92-101.
- [13]郭立平.精准扶贫的内生矛盾与改革建议[J].宏观经济管理,2018(9):49-54.
- [14]Zacharias A. How Time Deficits and Hidden Poverty Undermin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C].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Press, 2017:4-17.
- [15]朱华桂.论风险社会中的社区抗逆力问题[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2(5):47-53+159.

- [16]陈艾,李雪萍.脆弱性—抗逆力:连片特困地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J].社会主义研究,2015(2):92-99.
- [17]韩斌,孔继君.脆弱性—抗逆力视角下西部地区精准扶贫策略优化研究——以云南省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8(8):1157-1162.
- [18]孟越,陈文宽.抗逆力视域下生态脆弱区农户生计发展研究——以四川藏区为例[J].科技促进发展,2019(10):1164-1171.
- [19]左停,苏武峥,赵梦媛.提升抗逆力: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民生计系统“风险—脆弱性”应对策略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2020(4):129-136+178-179.
- [20]何昊,白永秀.社会资本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实证检验[J].统计与决策,2021(6):5-9.
- [21]刘七军,韦孟丹,李昭楠,等.典型深度贫困区农户脆弱性测度及其差异性研究——基于内陆干旱区微观调查数据[J].中国农机化学报,2020(7):215-223.
- [22]顾宁,刘洋.产业扶贫降低了贫困农户的脆弱性吗[J].农业技术经济,2021(7):92-102.
- [23]耿新.民族地区返贫风险与返贫人口的影响因素分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68-75.
- [24]谢家智,姚领.社会资本变迁与农户贫困脆弱性——基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的视角[J].人口与经济,2021(4):1-21.
- [25]潘锡泉.金融支持我国农村精准脱贫效应研究——基于2014—2020年省域贫困县数量变化视角的经验分析[J].金融教育研究,2021(4):43-49.

Study on Poverty Risk Inspection and Resilience Improvement of Rural Marginal Poverty Groups

——Take Tibetan-related Areas in Sichuan and Gansu as an Example

TANG Yashuang, ZHANG Huaquan, HE Yiran, ZHU Li

(College of Economics,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13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data of 437 farmers and herdsmen's families in Tibetan-related areas in Sichuan and Gansu provinces, this paper uses VEP method to measure the poverty vulnerability of sample families, and then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verty vulnerability from an empirical point of view, and further clarifies the contribu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through the Shapley value decomposition method. The study found that: (1) At least 10% of sample households face high risk of poverty. (2)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level,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the diversity of livelihoods, the identity of village cadres and the willingness of self-development can effectively reduce poverty vulnerability, while health shocks, the increase of family dependency ratio and the impact of natural disasters significantly increase poverty vulnerability. Among them,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level,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and the diversity of livelihoods have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the change of poverty vulnerability.

Key words: Tibetan-related areas; Poverty risk; Poverty vulnerability; Resistance

(责任编辑:罗序斌)